



中国史学史

◎白寿彝 主编

吴怀祺 著

五代辽宋
金元时期

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

第 四 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史學史



中国史学史

◎ 白寿彝 主编
吴怀祺 著

第 四 卷

五代辽宋
金元时期

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史学史. 第4卷, 五代辽宋金元时期: 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白寿彝主编; 吴怀祺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08-06619-1

I. 中... II. ①白...②吴... III. ①史学史—研究—中国—五代十国时期 ②史学史—研究—中国—辽宋金元时代 IV.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4285 号

责任编辑 张美娣

封面装帧 王小阳

中国史学史

(第四卷)

白寿彝 主编

五代辽宋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

吴怀祺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9.5 插页 4 字数 312,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7-208-06619-1/K·1267

定价 34.00 元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目 录

第一章 五代史学概说	1
第一节 历史观念的增强,当代史撰修的重视	1
一、史馆制度	1
二、当代史记录与编修	4
三、前代史——唐史之修	6
第二节 儒释道的交融与学术变化趋向	9
第二章 两宋史学概说	11
第一节 宋元时期史学的继续发展	11
第二节 社会的变化和史学	15
第三节 两宋的学术与史学	23
一、《易》学与史学思想	24
二、《春秋》学与历史编纂学	29
第四节 历史文学的成就与历史文献学	32
第五节 修史机构的完善	34
第三章 《新五代史》、《新唐书》的成就	38
第一节 《新五代史》的编修	42
第二节 欧阳修的易学、理学和史学	51
第三节 疑古辨伪和欧阳修的历史文献学	60
第四节 历史文学上的主张和成就	67
第四章 《资治通鉴》的编修与成就	70
第一节 《资治通鉴》的编修	70

第二节	“王、霸无异道”的思想	73
第三节	《资治通鉴》的指导思想是“资治”二字	77
第四节	历史编纂学思想和史料学观点	83
第五节	概说司马光的《易》学与史学	87
第六节	范祖禹的《唐鉴》	92
第五章	北宋的理学与史学	99
第一节	史学在二程理学中的地位	101
第二节	历史盛衰论	104
第三节	随时变易以从道	114
第四节	二程的学术评论	118
第六章	南宋的理学与史学	124
第一节	理学观念下的史学	124
第二节	穷经观史,以求义理	128
第三节	王霸义利之争	132
第四节	朱熹的易学与史学	139
第五节	《资治通鉴纲目》与《伊洛渊源录》	145
第七章	宋代的地区性史学	159
第一节	地区性史学概说	159
第二节	浙东史学的特点	164
一、	吕祖谦的史学思想	167
二、	《困学纪闻》的史考、史论	190
第八章	方志、杂史、笔记与金石	200
第一节	方志	200
第二节	别史、杂史和笔记	205
第三节	金石、金石学与《通志·金石略》	207
一、	宋代金石学与金石文献的双重价值	207
二、	分类研究的方法	210
第九章	《通志》的特点与成就	214
第一节	《通志》的编修与成就	214

第二节 《通志》的史学批评	219
第三节 《通志》的史学思想	222
第十章 辽代史学	234
第一节 辽代史学概述	234
第二节 辽代史学的产生、繁荣与嬗变	236
第三节 契丹、汉族先民关系认同的历史意识	243
第四节 历史的借鉴：治国安邦的智慧来源	246
第十一章 金代史学	251
第一节 重视历史的民族	251
第二节 实录与直书论的争议	256
第十二章 元代史学概说	264
第一节 《宋史》、《辽史》、《金史》与《元朝秘史》	266
第二节 典制体史书	271
第三节 传记与史论	273
第十三章 《通鉴注》与《文献通考》	275
第一节 《通鉴注》的文献学成就与史论	275
第二节 《文献通考》的史识与历史文献学的成就	283
一、《文献通考》对历史的总结	289
二、历史编纂学上的创造	301

第一章 五代史学概说

五代是一个干戈纷争的时代，也是从分裂时代过渡到统一王朝的阶段。在学术上，五代史学继承了唐代史学的规模与格局，为北宋前期的史学打下了基础。在文化上，五代之时又为宋代文化更新作了准备。

第一节 历史观念的增强，当代史撰修的重视

五代史学突出的是对当代史撰修的重视，这里也包括对前朝史撰修的重视。在短短的五十多年，政权更迭频繁，但无论是五代时哪个朝代，都重视历史，重视当代史的记载；史馆成为记载、修史的重要机构；在史学领域内，实录史学尤为突出。

一、史馆制度

五代各个朝代，史馆的作用并没有因为战乱而有所削弱，有关史馆的记载很多，例如：

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四月戊辰，是日，“宋州刺史王皋进两岐麦，陈州袁象先进白兔一，付史馆编录，兼示百官”^①。通过记录祥瑞与灾异的事实，可以看出史馆的存在。

又，后梁龙德元年(921年)二月壬申的一条记载，有重要意义。史馆上言：

^① 《旧五代史》卷三《梁书·太祖纪第三》，第49页。因五代史书编修事项记载零碎，所以特标注《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相关内容的页码，以便查核。

“伏见北齐文士魏收著《后魏书》，于时自魏太武之初，至于北齐，书不获就，乃大征百官家传，刊总斟酌，随条甄举，搜访遗亡，数年之间，勒为一代典籍，编在北史，固非虚言，臣今请明下制，敕内外百官及前资士子、帝戚勋家，并各纳家传，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术德业灼然可考者，并纂述送史馆。如记得前朝会昌已后公私，亦任抄录送官，皆须直书，不用文藻。兼以兵火之后，简牍罕存，应内外臣僚，曾有奏行公事，关涉制置，或讨论沿革，或章疏文词，有可采者，并许编录送纳。候史馆修撰之日，考其行所上公事，与中书门下文案相符合，或格言正辞询访不谬者，并与编载。所冀忠臣名士，共流家国之耿光；孝子顺孙，获记祖先之丕烈。而且周德见乎殷纪，舜典存乎禹功，非唯十世可知，庶成一朝大典。臣叨庸委任，获领监修，将赎素餐，辄干玄览。”

诏从之。^①

史馆请大规模编修实录，措施相当周详，得到了人主的首肯。这些措施有：

一是，“敕内外百官及前资士子、帝戚勋家，并各纳家传，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术德业灼然可考者，并纂述送史馆”。

二是，“如记得前朝会昌已后公私，亦任抄录送官”。

三是，由于兵火，大量朝廷档案被焚毁，因而收集各种材料，加以弥补就显得十分必要，“内外臣僚，曾有奏行公事，关涉制置，或讨论沿革，或章疏文词，有可采者，并许编录送纳”。

史馆之士提出了材料考证的原则：口述、回忆材料应当“皆须直书，不用文藻”；有关朝廷档案、文献方面的材料的真实性，必须通过在修史时，“考其行所上公事，与中书门下文案相符合；或格言正辞询访不谬者，并与编载”。这样，才可以保证史料的客观性。史馆之士提出的主张对保存史料起了很大作用，为后日大规模编修唐史、五代史奠定了基础。

史馆的规模和作用，在一些记载中看起来。

后唐长兴二年(930年)，当西川孟知祥称大蜀，年号明德，史馆奏：“凡书诏及处分公事，臣下奏议，望令近臣录付当馆。”诏端明殿学士韩昭裔、枢密直

^① 《旧五代史》卷十《梁书·末帝纪下》，第145—146页。

学士李专美录送^①。

后唐长兴三年(931年)二月“己卯,以前河中节度使索自通为鄜州节度使。怀化军节度使李赞华进契丹地图。诏司天台,除密奏留中外,应奏历象、云物、水旱,及十曜细行、诸州灾祥,宜并报史馆,以备编修”^②。

可见,史馆在记录一代军国大事、有关社会生活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很及时,作用非常清楚。

在战争年代,史馆记录军国大事的作用不能正常发挥,流于形式,“史官唯凭百司报状,馆司但取两省制书,此外虽有访闻,例非端的”,史馆之士对此提出意见。五代末年,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年),冬十月戊午,监修国史李穀等上言曰:

“窃以自古王者,咸建史官。君臣献替之谋,皆须备载;家国安危之道,得以直书。历代已来,其名不一,人君言动,则起居注创于累朝;辅相经纶,则时政记兴于前代。然后采其事实,编作史书。

盖缘闻见之间,须有来处;记录之际,得以审详。今之左右起居郎,即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执笔,立于殿阶螭头之下,以纪政事。后则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枢密直学士,皆轮修日历,旋送史官,以备纂修。及近朝,此事皆废,史官唯凭百司报状,馆司但取两省制书,此外虽有访闻,例非端的。

伏自先皇帝开创昌运,及皇帝陛下纘嗣丕基,其圣德武功,神谋睿略,皆系万机宥密,丹禁深严,非外臣之所知,岂庶僚之可访,此后欲望以咨询之事,裁制之规,别命近臣,旋具抄录,每当修撰日历,即令封付史臣,庶国事无漏略之文,职业免疏遗之咎。”

从之。因命枢密直学士,起今后于枢密使处,逐月抄录事件,送付史馆。^③

关于起居注、时政记的撰写,日历的产生,以及撰写日历的左右起居郎和学士的职责,规定得十分清楚。五代时期的史馆在编修一代国史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是唐代史馆制度的继续与发展。

① 《旧五代史》卷四十六《唐书·末帝纪上》,第634页。

② 《旧五代史》卷四十三《唐书·明宗纪》,第589页。

③ 《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四《周书·世宗纪一》,第1521页。

二、当代史记录与编修

在五代史书中,《实录》是大宗。下面摘引的材料可以见其大端。

后唐贞明中(915—920年),史臣李琪、张袞、郅殷象、冯锡嘉奉诏修撰《(梁)太祖录》三十卷,“叙述非工,事多漏略,复诏(敬)翔补缉其阙,翔乃别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编遗录》,与实录偕行”^①。

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何瓚言张昭远有史学,尝私撰《同光实录》十二卷。

后唐天成四年(929年)十一月己卯,史学张昭远等以新修献祖、懿祖、太祖《纪年实录》共二十卷、《庄宗实录》三十卷上之,赐器帛有差^②。

后周广顺元年(951年)秋七月壬申,史官贾纬等以所撰《晋高祖实录》三十卷、《少帝实录》二十卷上之^③。

后周显德四年(957年)春正月壬寅,兵部尚书张昭上言:“奉诏编修太祖实录及梁、唐二末主实录。伏以撰《汉书》者先为项籍,编《蜀记》者首序刘璋,贵神器之传授有因,历数之推迁得序。伏缘汉隐帝君临在太祖之前,历试之绩,并在隐帝朝内,请先修隐帝实录,以全太祖之事功。又以唐末主之前有闵帝,在位四月,出奔于卫,亦未编纪,请修闵帝实录。其清泰帝实录,请书为废帝实录,从之。”^④

实录在五代时期很有成绩。如《五代梁太祖实录》三十卷,李琪、张袞、郅殷象等撰;《五代唐懿祖纪年录》一卷;《五代唐献祖纪年录》一卷;《太祖纪年实录》、《五代唐庄宗实录》三十卷,张昭远、赵凤(张昭远因避讳后汉高祖刘知远,作张昭)等撰;《五代唐明宗实录》三十卷,张昭远、姚颢等监修;《五代唐愍帝实录》三卷,张昭远等撰;《五代唐废帝实录》十七卷,张昭等同撰;《五代晋高祖实录》三十卷,贾纬等监修;《五代晋少帝实录》二十卷,贾纬、窦贞固等监修;《五

① 此事见于《旧五代史》卷十八《梁书·列传八》,第250页,又见《旧五代史·唐书五十八·列传(李琪传)第十》,但“张袞”在此处作“张充”,第783页。

② 参见《旧五代史》卷四十《唐书·明宗纪》,天成四年秋七月的注文,第552页,及《旧五代史》卷四十,《唐书·明宗纪》十一月丁卯条,第555页。同为《实录》,但只有庄宗一朝称《实录》,其余三部不作《实录》,监修国史赵凤在秋七月上奏中已有说明。

③ 《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二》,第1473页。

④ 《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四》,第1555页。

代汉高祖实录》十卷，贾纬、苏逢吉等监修；《五代汉隐帝实录》十五卷，《五代周太祖实录》三十卷，并张昭、尹拙、刘温叟等撰；《五代周世宗实录》四十卷，宋王溥等监修；《南唐烈祖实录》二十卷，高远撰；《后蜀高祖实录》三十卷，郭廷均等监修；《后蜀主实录》四十卷，赵元珙等撰，李昊监修。

北宋太祖建隆间昭文馆大学士范质以五代实录共三百六十卷为繁，遂总为一部，命曰《通录》，肇自梁开平迄于周显德，凡五十三年。乾德五年三月戊申，范质上所撰《五代通录》^①。由于当初梁末帝无《实录》，范质自以闻见补成之。《崇文总目》称赞这部书，说：“其缜次时序最有条理。”五代史书的成就直接影响到北宋史学的发展。

人物列传是当代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后唐长兴季年，修成《创业功臣传》三十卷^②。后唐闵帝应顺元年（934年）秋七月乙丑，史官张昭远以所撰庄宗朝《列传》三十卷上之^③。

典制也是当代史重要的内容，在修政典等史书上，有时亦有争议。后晋高祖天福四年（939年）春正月，左谏议大夫曹国珍上言：“请于内外臣僚之中，选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后会要》、《礼阁新仪》、《大中统类》、《律令格式》等，精详纂集，俾无漏落，别为书一部，目为《大晋政统》。”高祖同意此事，并议论选派十九名官员从事这项工作^④。作为典制史的汇集，是必要的，但如称之为《大晋政统》，汇集历代典制之书，成了一代典制，自然引发争议。文矩上书驳之，称此事是备录前代礼乐刑宪之制，如果作本朝之政统，则不可，“是名不正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而媚时掠美，非其实矣”。这件事遂停止。但于此可以看出，君王为编修一朝史书政典之书，听从了各方面的意见。

后周显德五年（958年）七月，“中书门下新进册定《大周刑统》奉敕班行天下”^⑤。这些都是典制史方面的材料。

五代十国之世史书相当可观，以《郡斋读书志》的著录，参之《通志》的《艺文略》与《文献通考》的《经籍考》，可以看出就是在这样政权不断更迭的动乱年代，时间总共只有五十三年，但公私著述、官修史书和野史笔记的数量相当大。

① 《玉海》卷四十八《建隆五代通录》。

② 《旧五代史》卷六十七《唐书·列传十九》，第893页。

③ 《旧五代史》卷四十六《唐书·末帝纪上》，第638页。

④ 《旧五代史》卷七十八《晋书·高祖纪四》，第1025—1026页。

⑤ 以上见《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八《周书·世宗纪五》，第1574页。

《通志》卷六十五的《艺文略》著录的有：《汴水滔天录》一卷；《汴州记》一卷；《梁太祖编遗录》三十卷；《梁列传》十五卷；《后唐列传》三十卷；《庄宗召祸记》一卷；《晋朝陷蕃记》四卷，《陷蕃记》四卷；《陷虏记》三卷，《周世宗征淮录》一卷；《入洛私书》十卷；《后史补》三卷；《备史》六卷；《王氏闻见集》三卷；《续皇王宝运录》十卷，等。

《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三至二百的《经籍考》记录有关史书，除《实录》外，还有：荆南孙光宪：《续通历》十卷（卷一百九十三）；贾纬：《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唯论次多阙误，而事迹粗存，亦有补于史氏”（卷一百九十三）；后唐尉迟偓：《中朝故事》二卷，“记唐懿昭哀三朝故事，故曰中朝”；南唐程匡柔：《大唐补记》三卷（卷一百九十六）；敬振（梁宰相敬翔子）：《朱梁兴创遗编》二十卷（卷一百九十六）；后唐中书舍人黄彬：《庄宗召祸记》一卷（卷一百九十六）；蜀王仁裕：《入洛记》一卷（卷一百九十六）；后周余知古：《渚宫故事》五卷（卷一百九十八）；信都镐：《淝上英雄小录》二卷（卷二百）；南唐滁州刺史王颜：《南唐烈祖开基志》十卷（卷二百）；南唐史馆修撰高远：《南唐烈祖实录》十三卷，远又尝作《吴录》二十卷（卷二百）；徐铉：《江南录》十卷（卷二百）；蜀杨九龄：《蜀桂堂编事》二十卷，“晁氏曰：蜀杨九龄撰，杂记孟氏广政中举试事”（卷二百）；蜀学士毛文锡、平珪：《前蜀记事》二卷（卷二百）；契丹人赵志忠：《虏廷杂记》十卷；《北辽遗事》二卷，晁氏曰：“不题撰人，盖辽人也，记女真灭辽事”（卷二百）；后唐晋王佑：《南行记》三卷（卷二百四）等。

三、前代史——唐史之修

修唐史，在五代史臣来说，同样也体现出重当代史风气。这里应当叙述一下五代时的史臣。宰执重臣监修国史，正是上继唐代史学而下开宋代史学风气^①。除宰臣监修国史外，还有史职人员。据《五代会要》卷十三，“起居郎起居舍人”条记载，“后唐天成四年十二月，尚书比部员外郎崔棨奏请，自今后，每遇起居令、左右

^① 以后唐为例，如：同光元年夏四月，以行台右丞相卢澄为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同年冬十月甲午，以郭崇韬为开府仪同三司、守侍中、监修国史；天成元年五月丙辰，韦说进位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监修国史，并依旧平章事；天成二年春正月癸亥，任圜加光禄大夫、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天成四年八月丁酉有监修国史赵凤；长兴二年五月己未，有监修国史李愚加特进事；十二月乙亥，以卢文纪为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末帝清泰二年夏四月有监修国史张延郎兼集贤殿大学士记载，等。

史,随宰臣上殿,各赍纸笔分侍冕旒,或阶下发一德音,宰臣陈一时政,事无大小,皆令编录。季终即送史馆。”可见还有起居令、左右史、起居郎和起居舍人。

史馆外有起居院,起居院有关记录,要送史馆,如后唐长兴二年(931年)八月“敕准故事,应朝廷凡行制敕,并宜令起居院抄录关送史馆”。

与唐史编修有关的史臣,首先要提到的是赵莹。

赵莹,后晋高祖时,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在修唐朝史上,赵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①

据《五代会要》卷十八“前代史”,晋天福六年(941年)^②二月敕:“有唐远自高祖,下暨明宗,纪传未分,书志咸阙,今耳目相接,尚可询求。若岁月寢深,何由寻讨。宜令户部侍郎张昭(远)、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吏部郎中郑受益、左司员外郎李为先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赵莹监修。”

其年四月,监修国史赵莹奏,敕同撰唐史起居郎贾纬丁忧,请以刑部侍郎吕琦、侍御史尹拙同修,从之。寻改吕琦为户部侍郎,尹拙为户部员外郎,令与张昭(远)等修唐史。

监修国史赵莹上奏,谈到修《唐书》要多方面收集史料的意见,说:

自李朝丧乱迨五十年,四海沸腾,两都沦覆,竹简漆书之部帙,多已散亡;石渠、金马之文章,遂成残缺。今之书府,百无二三。臣等虔奉纶言,俾令撰述,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按于旧章,既阙简编,先虞漏落,今据史馆所缺唐书实录,请下敕购求。昔咸通中,宰臣韦保衡与蒋伸、皇甫燠撰《武宗、宣宗两朝实录》,又光化初,宰臣裴贽撰《僖宗、懿宗两朝实录》,皆遇国朝多事,或值皇舆播越,虽闻撰述,未见流传。其韦保衡、裴贽合有子孙,见居任职;或门生故吏,曾托纂修。……闻此撰论,谅多快愜,况行恩奖以重购求,请下三京诸道及中外臣僚,凡有将此数朝《实录》,诣阙进纳,请量其文武才能,不拘资地除一官;如卷帙不足,据数进纳,亦请不次奖酬,以劝来者。自会昌至天福,垂六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党,著武宗伐叛之书,其后康承训定徐方,有武宁本末之传,如此事类,记述颇多……

^① 《旧五代史》卷八十九《赵莹传》,第1170页;另参《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七。

^② 《廿二史劄记》卷十六《旧唐书源委》,作天福五年,误。

请下中外臣僚及名儒宿学,有于此六十年内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史馆日历、制诏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臣(赵莹)与张昭(远)等所撰《唐史》,只叙《本纪》、《列传》、《十志》。《本纪》以纲帝业,《列传》以述功臣,《十志》以书刑政。^①

赵莹奏言,被认可。同月,起居郎贾纬说到材料事,上奏说:“伏以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凡六代,惟有《武宗实录》一卷,余皆缺略。臣今搜访遗文,及耆旧传说,编成六十五卷,目为《唐朝补遗录》以备将来史官条述。”

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六月,史馆上新修唐朝史书,即《旧唐书》的纪志列传,共二百二十卷,并目录一卷,都计二十帙。时赐监修宰臣刘昫、修史官张昭远、直馆王伸等缿彩银器各有差。时,刘昫监修国史,所以《旧唐书》撰著者,首列“刘昫”之名;但“监修则赵莹之功居多,纂修则张昭远、贾纬、赵熙之功居多”^②。

在修唐史方面显示出才华的,还应当提及贾纬。贾纬为真定获鹿人,据宋祁《景文集》,“(贾)纬博学善词章,论议明锐,一时诸儒皆屈”。贾纬属文之外,勤于撰述,因为“唐代诸帝《实录》,自武宗已下阙而不纪,乃采掇近代传闻之事,及诸家小说,第其年月,编为《唐年补录》,凡六十五卷,识者赏之”,叙成败事甚悉,书显于时。后晋天福中,人为监察御史,改太常博士。贾纬常以史才自负,锐于编述,未几,转屯田员外郎,改起居郎、史馆修撰。“纬长于记注,应用文笔未能过人,而议论刚强,侪类不平之,因目之为‘贾铁嘴’。”贾氏评论历史人物,任情褒贬之举,为时人非议^③。

此外,还有一些重史的人物,如匡凝。匡凝刚毅有谋略,尤好《春秋左氏传》,时人称之为“史三传”^④。

^① 参见《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七《国史部·采撰》,《五代会要》卷十八《前代史》中收录赵莹上奏,但错漏较多。

^② 参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十六《旧唐书源委》。

^③ 参《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周书·列传》,第1728页。

^④ 《旧五代史》卷八十六《晋书·列传》,第1151页。

第二节 儒释道的交融与学术变化趋向

五代人君有重经史的风气，后唐闵帝继位之时，“志修德政”，“延访学士读《贞观政要》、《太宗实录》，有意于致理”^①。再如，天福三年（938年）（后晋）太祖对韩建设说：“公顷在华阴，政事之暇，省览经籍，此亦士君子之大务。今之青土，政简务暇，可复修华阴之故事。”^②他以论读书，要臣下注意道德修养。

刊刻经籍，是一代学风的体现。后唐长兴三年二月辛未，中书奏：“请依石经刻《九经》印板。”^③关于刊刻经籍事，史书记载不同，《旧五代史考异》引《五代会要》、《通鉴》、陶岳《五代史补》等作了考订。所刻的书不只有经部书，应当是“经史”之作。此事见于《猗寮杂记》，该书引录材料，说：“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如有墨板，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有经史，以镂板为正。”《考异》者说：“大概唐末渐有印行，特未盛行，后人遂以为始于蜀也。当五季乱离之际，经籍方有托而流布于四方。”因此，雕板印行史籍是在情理之中，这为后日大规模编纂文史书籍提供了条件。《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出现，不是偶然的。

五代时，人们对释道的宗教的认识也在变化，出现释道兼取的倾向，一些士人对释道有新的解读。马胤孙是一个例子，时人视他为“三不开”的人，即“口不开，印不开，门不开也”。他对佛释态度变化，很可玩味。“（马）胤孙好古，慕韩愈之为人，尤不重佛。及废居里巷，追感唐末帝平昔之遇，乃依长寿僧舍读佛书，冀申冥报，岁余枕藉黄卷中，见《华严》、《楞严》，词理富赡，由是酷赏之，仍抄撮之，相形于歌咏，谓之《法喜集》。又纂诸经要言为《佛国记》，凡数千言，或嘲之曰：‘公生平以傅奕、韩愈为高识，何前倨而后恭，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胤孙笑曰而答曰：‘佛佞予则多矣。’”^④

所为“佛佞予则多矣”，实际是要佛学为我所用，而不是“佞佛”。

另一件重要的事，是陈抟的活动，陈抟“及长，读经史百家言”，又“颇以诗

① 见《旧五代史》卷六十七《唐书·列传十九》，第894页。

② 《旧五代史》卷十三《列传第三》，第177页。

③ 《旧五代史》卷四十三《唐书·明宗纪》，第588页。

④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周书·列传七》，第1670页。